

相当熟悉而有亲切感，但不认识年轻的助教们，乃一一问及。当最后问到我时，我说：“我叫王钟山，是袁先生的临时助教。”他立即说，你暂时不要去昆明，这里需要人，我给你安排工作。我从内心感谢老校长对晚辈的体贴和关怀。

这样，我就未随队继续西进云南，留在了贵阳，不久又到贵州省气象所任职。在5月1日后，贵阳清华中学开始招生，我兼任地理教员，暂时安稳下来。

### 尾声——步行团周年纪念

1938年底，得到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

的通知，我已经被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并获得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的地貌研究工作的补助费，要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这样，我又到西南联大开始新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我到昆明后，于1939年4月底，应黄钰生教授之请，参加了在他家举行的步行团到达昆明周年纪念的聚会。黄先生对步行团实在情深，贯穿于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全部工作进程——既彪炳着爱国、爱科学文化，继承和发展教育的伟大事业之中，也鼓舞我终身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奋进。

## 参加松山战役的点滴经历

○ 陶愉生（1942入学，联大）



陶愉生学长

陶愉生（1923—2014），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一生中有两个较为重要的贡献：1943年21岁时，为抗日而中断学业，成为抗日盟军英文翻译中的一员。1966年12

月，带领他的激光研究小组成功地发射出中国的第一条激光——红外化学激光，让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激光技术的国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

1943年底，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化学系读大二，学校动员同学们去当美军译员。对于从“九一八”事变时还在小学的我，已深深种下憎恨日本人的根，远在兰州的母亲刚刚去世还不到一年，我没有来得及和在四川李庄的父亲（陶孟和）商量，就毅然决然地报了名。

从11月中旬起，我们在译员训练班受了六周的训。该班由联大社会系的吴泽霖教授主持，下面授课的多是联大教授。如



1995年春，陶愉生与夫人于纽约

黄中孚，从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到西南联大他都是我的体育老师；戴世光，原经济系教授，等等。另外，也有美国人。准备去印度的译员和我们这些将留在国内的，都不是一个班。训练班结束时，我们每个人都分配了去处。我被分配到滇南国民党第八军军部所在地古木，由美军敞篷大卡车把我们送到那里。我们先在古木帮忙培训了一些军士和下级军官，约有1~2个月。我当翻译的首位军官是史密斯上尉（Captain Malcolm Smith），直至1944年几乎一直任他的译员。

1944年，真正进入松山战场是7月刚刚开始。原来听说日军为了修建松山战场上的五个堡垒曾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堡垒下面的一段一段的树杆之粗大一个人远远抱不过来。那时我到云南已两年多，对云南气候的适宜深有体会。平时在昆明下雨时，既不用雨伞，也不需雨衣，一旦下起雨来只要找个避雨的地方躲上十来分钟就会雨过天晴，青天白云之美绝无仅有。7月初的松山天气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不但日夜不停的小雨连绵不断，而且还同时在下相当浓的雾，因此在十米之外都无法

看清人的面孔。这就给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添加了一个大难题——战场上的能见度太差了。后来又听说过，缅甸战场上的日军躲在森林里，可以用步枪上特制的瞄准镜把800米远处的美军射杀，连一名中国译员也未能幸免。可见与天气晴朗时的能见度相比有如此大的差别。

我们103师来到战场之前，已有“荣誉第一师”把日本人修的五个堡垒团团围住，但是他们并未对日军作战。据我们后来所知，“荣誉第一师”是个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部队，几乎每个战士都受过枪伤，甚至有些人身上还留有取不出来的子弹。仅从这点对比，103师则远远地赶不上。再加上“荣誉第一师”没有任何和这五个堡垒日军作战的经验可以传给103师，因此103师只得从头摸索。听说日本军部对这批日本守军的要求就是守住三个月可算完成任务，因为松山是滇缅公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隘，只要守住松山，从仰光开入内地的大小汽车便根本无法通行，从而使内地无法得到国外物资的支援。公路运输总是比飞机运输多许多。不知何故，103师到达松山时偏偏是雨雾，如此不利于作战的时刻。

这时Captain Smith和我每个人都发了一个被称为树林吊床的jungle hammock，即在两棵大树或支柱上固定的一种防雨的吊床。它既可在野外森林中使用，又可在当地居民家中使用。因为作战期间需要不断转移睡眠地点，用了它就可迅速搬家，非常方便。在对日军作战的两个半月期间，我们一直如此度夜，甚至雨相当大时身上都不会沾湿。这时在五个日军堡垒上空，中国飞机经常向下撒传单，有时传单也会落到我们自己阵地的一边。其中给我

印象最深的一张传单上面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样的中文诗句，日本人肯定能读懂。不知有多少日本官兵，让自己的妻子在这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后都沦为独守空房的寡妇。对于亲历过这样残酷战争的人，背这两句诗时最容易流泪。

在这样阴雨连绵再加上重雾的日子里约等了两周，好不容易到了一天，上午约九十点钟左右，居然绽露出阳光。这时我们抓紧时机，马上用一个营先攻取五个堡垒中的一个。领导这一仗的是叶营长，Captain Smith 和我都在他的身旁。当时日军先用炮兵打炮到指挥作战的附近山头。Captain Smith 马上对大家说，让所有的人都趴倒在地上。叶营长刚听完我的翻译立刻就笑起来，并对我说：“从炮弹的声音就能知道这些炮弹离开我们这里的距离，还没到卧倒在地的时候。”这恰恰说明Captain Smith并没有过这类作战的实际经验。

被攻打的山头很快就被我军占领。但正好这时天气又突然转阴，雨和雾一下子又回来了。不想这时另四个山头都有多个洞口，从中伸出机关枪对准被占领的山头不断扫射，于是被占领山头上我军士兵全部阵亡。这时，在山下还活着的一些人立刻上前，把死者的枪支抢回来。有的一个人抱五六支，最多的达十余支。这些人在浓厚的雨雾中抱着枪支跑回自己阵地的情景，令我终生不忘，而且总要潸然泪下。

这短暂的一仗，前后不到两小时。通过这一仗103师才取得教训，必须更改攻击的方式。此后地面战争不再，全都改成挖地道，从堡垒的最底下挖通一个个洞消灭日军。这一招果然奏效，但因地面上再也看不到战争，Captain Smith和我也无法挤到狭小的地道中去，因此此后战事的实际情况，我们再也无从目睹。大约到9月中旬，日军的五个堡垒全部被击溃。我们当时听到的是跑了十几个日军，我们还目



1950年9月，陶愉生等百余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海域，回国胜利在望。图为留学生在船尾合影

## □ 联大春秋

睹了十几个投降的日军的情景。他们都盘腿坐在地上，还有的把战刀拿在手上作剖腹自杀之态，但一个也没有动真格的。这时雨雾消失殆尽，所有投降日军的一切动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在无地面战争的那段时间也有些值得回忆的几件事。

一是在第一次地面战争中，日方还能对我方发炮。这时，我们很快得到了105mm口径的榴弹炮。这种大口径的榴弹炮比起我们原有的75 mm口径的山炮威力大多了。山炮的优点是很容易被拆成几小块用牲口搬运，既可以越过山头，又可以安置在最方便的地点对敌攻击。而威力更强大的榴弹炮只能用大卡车搬运，并限定在公路旁使用。而当我们的榴弹炮发挥作用不到两星期，日军的炮弹就再也打不过来了，因为他们炮上的瞄准镜全部被摧毁，根本无法再发射了。

由此一简单对比，可见武器先进性在战争中举足轻重。当然士气是更重要的根本问题了。直到50年代我被派到大连参加了工作，这时有机会旅游到世界闻名的旅顺口海军港口，从而看到1904—1905年日俄战争遗址，才知道当时俄军占的是居高临下的山头，没在乎山下的日军。日军如果从险要的陡度那么大的山底向上攻，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当时指挥作战的日本指挥官乃木大将，一下子把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全杀死了。这下子整个日军都不顾自己的死活，拼了命地沿山坡向上冲去，最后俄军终于败走。这个遗址真能发人深省，乃木靠这样的指挥技巧，一下子把士兵的勇气鼓舞起来，取得日俄战争的决胜性胜利。

另一件事是当103师挖地道摧毁日军

的几个堡垒时，他们也曾派出两个日本兵对我方偷袭。那次Captain Smith和我的吊床正好被安置在村民家。早晨起床不久，两个日军已来到我们住处的山坡下，但很快就被很多村民发现，偷袭并未能得逞，这两名日军都跑回去了。

五个堡垒被摧毁后，按我们当时听到的数字，死去的日军达2400~2500人。这时我们住的地方已十分安全了，103师就为Captain Smith派来一名专门照顾他的勤务兵。

一天早晨，来了一位全身长癞的国民党兵想要喝水，就到那位勤务员处要一杯水喝。没想到那位勤务员不但不给水喝反而把他撵走，我当时正好在旁边，看到情景就告诉那位勤务员不可以如此对待那位可怜的满身长癞的士兵，不想最终吵了起来，并引起许多人围观。

后来我们还打开了日军的粮食仓库，看到各种食品至少够日军再吃上半年。我们还有机会吃到日本兵平时吃的肉罐头。我们译员也吃美军的罐头食品，但日本的罐头真的比美国罐头更有滋味，适合我们东方人的口味。

文革以后，我原来在联大先修班（1941—1942）开始认识的梅祖彦（梅贻琦之子，后任清华水利系教授）有机会重回滇南，因他也曾在美军总部当过译员。据梅祖彦写信告诉我，他看到石碑上记载的松山战役日军死亡人数为4000~5000人，比起我当时知道的数字几乎多了一倍，不知究竟哪个更可靠。至于我军的伤亡人数我一直没能知道。但无论如何松山战役是打通滇缅公路最关键的一步。

（节选自作者《堪回首的一些往事》）